# 先秦音乐思想中的自然观

张　娟[①]

**内容摘要：**先秦时期，占据社会思潮主流地位的神学天道受到冲击，并产生了朴素的自然观“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为古人认识音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先民们对宇宙的本源与演化的认识，使得在关于音乐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存在一种普遍的自然音乐观。自然音乐观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同时以其对自然的认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音乐观念。它集中体现在对于自然与音乐的关系的思考。本文从先秦文献典籍《国语》、《吕氏春秋》、《管子》、《乐记》、《礼记·月令》中记载的音乐思想入手，首先对先秦时期自然音乐观进行梳理。

关于音乐起源，古人认为音乐源于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阴阳二气上下对流而成“风”，古人“效八音之风”而成乐，乐在本源上与自然界是一致的。关于音乐与自然的关系，“乐法天道”，乐体现、遵循自然界、宇宙世界的运行法则。人可以通过源于自然的音乐认识自然、影响自然。音乐成为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

先秦时期的自然音乐观，来自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科学整体的认识，并促使古人积极地思考音乐与自然世界、世界本源相对应的自然规律，直接促进了哲学层面上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和探索，使我们看清了中国音乐起源的独特之处，有利于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探讨，也将会成为中国科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音乐；自然观；阴阳五行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一个总体性的看法。古代的自然观，实质上是先民们开始尝试对大自然做出统一的合乎理性的说明。

先秦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发展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占据社会思潮主流地位的唯心主义神学天道观受到冲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即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

阴阳学说在我国起源很早。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就包含了原始的阴阳学说的思想，西周末伯

[①] 张娟，女，1979 年生，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联系方式： zhangjuan@sxu.edu.cn

阳父以阴阳说解释地震，标志着阴阳学说的正式形成①。世界万事万物由阴阳二气化生，古人“一阴一阳之谓道” 的说法，把阴阳的对立依存提到了基本规律——“道”的高度。阴阳学说用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说明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素。

原始的五行思想产生于古人治水斗争的壮丽实践②，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对五行生物的原则做了论述③。《尚书·洪范》:“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五行的性质做了进一步的说明，简要描述了五种构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形态的性质和作用。五行学说中五行与四时、五方相配贯通在一起，万事万物按五行法则相互作用，把世界看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特有的自然观。

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古人认为，天属阳，地属阴，两者相互作用，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阴阳和五行两种不同的学说就这样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周易·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即原始状态的天、地，包蕴“五行”金、木、水、火、土于自身，同时又兼阴阳二性。阴阳说用“阴气”和“阳气”的矛盾运动来解释自然现象。阴阳二气上下对流而生成万物，是天地秩序的根本原因，阴阳二气相互作用是所有自然万物变化的根源。阴阳四时变化，风雨雷霆相激，从而生成万物，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先秦时期的先民对宇宙的本源与演化的认识，使得在关于音乐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存在一种普遍观念——“天乐观”，即音乐与自然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同时音乐本身也遵循并且体现世界自然运行的规律。这种探索最初大概源于先民对自然的运行与音乐同样的协和有序的迷茫，由此拉开了中华文明揭示音乐与自然关系之奥秘的帷幕。

## 一、“乐”之本源

《吕氏春秋· 古乐篇》说：“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

《吕氏春秋·音律篇》：“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

《淮南子·主术训》通过对先秦音乐的总结，也指出：“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

---

① 关煜平　简评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的双重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7

② 远古治水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 张晓红 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年 3 月

③ 《国语·郑语》

古人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意识到四时各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四方之风，这些风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如湿度、温度特别是强度的差异，表现为音高不同的风声。此处之“风”，是由天气、地气，即阴阳二气汇合而生。太阳每运行至一定度次，月亮就聚集该月之风，由此产生十二乐律。所谓“乐效八方之风”，听四时八方之风，以八音十二律谱之，即“律”。

因此关于音乐的起源，《吕氏春秋·大乐》认为音乐和万物万象一样，由天地之间阴阳两气相摩而生：“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

《周礼·春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

据此，因“风”而生的十二律应十二月所吹四方阴阳之风。循此法，中国古代先哲在天地间，就是利用冬至时阴阳二气的运动找到黄钟音，即把天地之脉、察四时之情的“候气法”。先将十二支不同尺寸的律管，在三重密室内依十二辰方位竖直埋于地下，管上端与地持平，管腔内充以葭莩灰，用薄膜封口。至冬至日交节时分，九寸之律管必有葭灰逸出，届时即冬至时刻，而该管即黄钟律管。余皆类推既可得出十二律。也就是《吕氏春秋·音律篇》所讲：“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正，则十二律定矣[①]。……”

十二律必须以“候气法”根据由天地之气合而成的正风在一年中各个月中的自然律动而最终校定。由此可以看出，古人认为“乐”的产生是因为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产生“风”，效风而得律，“声成文，谓之音”，乐由天地之而生，乃是天地自然的产物。

二、“乐”法“天道”

“乐”与宇宙之乐拥有共同的基础，就应当遵循并且体现世界自然运行的规律，体现天地之“和”。

1．阴阳五行音律观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西周宣王时期（前827－781年）虢文公的观点：

“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

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稷则徧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

[①] 见《吕氏春秋·音律》

土与乐一样同函天地阴阳之气，故可借助音律的桥梁相沟通，探索土壤脉气状况。

乐与决定季节及季节之风的阴阳之气有密切的联系。周人认为春季立春之时，阴消阳长，阳气上升而产生协风，即和风。立春时，在举行籍田礼和开始春耕的前五天，知晓风声的瞽（乐太师，知风声者也）会告知有协风到来。在举行籍田礼和开始春耕的当天，瞽还得率领音官省察土风，听测风气土气是否适宜于耕种。

周景王（前 544 年一前 521 年）时候乐官伶州鸠关于音律的看法见《国语·周语下》：

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①]，平之以六[②]，成于十二，天之道也。”

伶州鸠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六律六间，由于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和周期性的规律变动流转产生三月一季和四季一年十二月。十二律就是效法这种阴阳之道即“天之道”，所以有三度生律法，有由阳六律和阴六间组成的十二律。以十二律比附十二月，用三度生律法比附一季三月的划分，企图从客观世界寻求十二律产生的根源，不失为一种朴素唯物主义。

伶州鸠提到“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注》：“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毕矣。而六为中，故六律、六吕而成天道。”）干支纪年中含有甲、子之年分别有六个、五个。六五之和为十一，十一则为天数，而六为十一之中数，故认为六为中数。古人以黄色为中色。这表明十二律和五行还有一定联系。

《国语·郑语》载公元前八世纪周幽王时期（公元前？——前 771 年）的太史史伯提出最早的五行说：

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于必弊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馋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合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史伯认为“五行”(“以土与金木水火杂”）是构成“百物”的五种基本物质元素，这是早

① 纪之以三：指以三分损益法定十二律。
② 平之以六：指将十二律分为阳数六律与阴数六吕。

期的五行说思想。对土的首要地位的强调，与农业社会影响有关。“百物”之一的音乐效法于“五行”。音乐的构成也要遵循杂“五行”以成“百物”的规律，应“去同而取和”，音乐应由属性、作用和音高不同的乐音构成，即“和六律以聪耳”。

史伯以其“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辩证观点看待音乐与自然的关系，提出“声一无听”、“和乐如一”，强调音乐“和”的本质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

伶州鸠的 “阴阳音律观”、史伯的五行音乐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周阴阳五行学说中以五音、十二律配于四时、五行、十二月的观点即导源于此[①]。

2.“六气五行”音乐观

子产，即公孙侨（前 582 年～前 522 年），郑国执政上卿。《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有郑国游吉（子大叔）转述过去执政上卿子产对于乐的看法：

（子大叔）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混乱，民失其性。……”

天生“六气”，“五行”是五种有形的基本物质元素，归于地。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源于“六气”和“五行”。“六气”、“五行”的变化流转是“天之经”、“地之义”，是“天地之经纬”，是自然之“礼”，也就是天地本身固有的秩序和规律。

子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音乐观，他认为音乐所使用的物质材料“五声”是“五行”的属性或作用的一种表现，即“章为五声”。子产认为音乐是天地相合所生的六气和与此相适应的五行的基本外在表现之一。

同样持有“六气”音乐观的还有秦国医生医和。

《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 541 年）》：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医和认为天有“六气”、地有“五行”，他的自然观也同属“六气五行说”。而在人的文化行为方面，则有“五节”，所谓“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中讲的“五节”，在音

[①]李纯一　先秦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7

乐行为方面就是以宫、商、角、征、羽 “五声”为音阶应用的规范。“六气”和“五行”有着内在的联系。“五行”由“六气”赋予，表现为“五味”、“五色”、“五声”。“六气”的运动规律“分为四时，序为五节”，且“四时”与“五节”相互配列。

在这种自然观的基础上，医和建立了他的音乐观：“五声”是“六气”赋予“五行”的一种属性，而“六气”的运动规律又表现为“五节”，所以由“五声”构成音乐，就应当仅仅使用与“五节”直接相对应的一组“中声”，即“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这表明医和也是企图从自然界中寻求“五声”和音乐的根源。

“五行”金、木、水、火、土既然孕育于太极及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形成之前的两仪——原始的天、地——之中，那么在太极发展的成熟阶段——即自然界、人类社会形成之后也蕴此“五行”因素于自身。于是无论是方位、季节，还是人的五脏，甚至社会意识形态、音乐五声等都与五行发生对应关系，形成包囊万象的哲学思想体系，古人以此来解释世界。

战国晚期邹衍学派与音乐有关的主要学说为“五德始终说”即“五行相胜说”，他们提出了五行相胜（克）相生的思想，且已把胜（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模式，自发地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及其整体把握的思想。

邹衍等人将音律与四季十二月、五行等相比附，并认为音乐与“天理”有密切的联系。五行理论不仅把金、木、水、火、土当作五种基本物质来讨论它们之间的这些关系，而且把它符号化，认为各代表着一类东西，如木在五色方面代表青，在天干方面代表甲乙，在五味方面代表酸，在五音方面代表角，……。这样，就把整个世界(包括社会方面)都纳入这个框架中了。

五音十二律与四时十二月的配比对应同样出现在《礼记·月令》、《管子》、《吕氏春秋》中。

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对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并且一一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

| 德 | 方 | 时 | 月 | 日 | 音 | 律 | 数 | 色 | 味 | 臭 | 虫 | 谷 | 牲 | 帝 | 神 | 祀 | 祭先 |
|---|---|---|---|---|---|---|---|---|---|---|---|---|---|---|---|---|---|
| 木 | 东 | 春 | 孟春<br>仲春<br>季春 | 甲乙 | 角 | 太簇<br>夹钟<br>姑冼 | 八 | 青 | 酸 | 膻 | 鳞 | 麦 | 羊 | 太皞 | 勾芒 | 户 | 脾 |
| 火 | 南 | 夏 | 孟夏<br>仲夏 | 丙丁 | 征 | 仲吕<br>蕤宾 | 七 | 赤 | 苦 | 焦 | 羽 | 菽 | 鸡 | 炎帝 | 祝融 | 灶 | 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季夏 | | | 林钟 | | | | | | | | | | | |
| 土 | 中 | | | 戊己 | 宫 | 黄钟 | 五 | 黄 | 甘 | 香 | 倮 | 稷 | 牛 | 黄帝 | 后土 | 中溜 | 心 |
| 金 | 西 | 秋 | 孟秋<br>仲秋<br>季秋 | 庚辛 | 商 | 夷则<br>南吕<br>无射 | 九 | 白 | 辛 | 腥 | 毛 | 麻 | 犬 | 少皞 | 蓐收 | 门 | 肝 |
| 水 | 北 | 冬 | 孟冬<br>仲冬<br>季冬 | 壬癸 | 羽 | 应钟<br>黄钟<br>大吕 | 六 | 黑 | 咸 | 朽 | 介 | 黍 | 彘 | 颛顼 | 玄冥 | 行 | 肾 |

成书于战国的《管子》与《礼记·月令》相似，《幼官》一篇中，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农业、人伦、仪礼、音乐、自然现象、人的生老病死、新陈代谢都与四时、五行相配。

| 五行 | 四时 | 五方 | 五日 | 五色 | 五音 | 五味 | 五数 | 五兽 | 五脏 | 五内 | 九窍 |
|---|---|---|---|---|---|---|---|---|---|---|---|
| 木 | 春 | 东 | 甲子 | 青 | 角 | 酸 | 八 | 羽 | 脾 | 隔 | 鼻 |
| 火 | 夏 | 南 | 丙子 | 赤 | 羽 | 苦 | 七 | 毛 | 肝 | 革 | 目 |
| 土 | | 中央 | 戊子 | 黄 | 宫 | 甘 | 五 | 倮 | 心 | 肉 | 下窍 |
| 金 | 秋 | 西 | 庚子 | 白 | 商 | 辛 | 九 | 介 | 肾 | 脑 | 耳 |
| 水 | 冬 | 北 | 壬子 | 黑 | 征 | 咸 | 六 | 鳞 | 肺 | 骨 | 口 |

《管子》建立了一个以气为本原、以阴阳为“天地之大理”、融阴阳说与五行说于一体、并配以四时(春、夏、秋、冬)五方(东、南、中、西、北)的比较完整的阴阳五行说体系。

稍后的《吕氏春秋》将五音(宫、商、角、微、羽)与五时(春、夏、长夏、秋、冬)相对应，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对应，构筑了一个时空统一、包罗万象的宇宙图式，认为自然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存在共同规律，构成统一和谐的整体。

| 五行 | 五时 | 十二月 | 五音 | 十二律 | 五方 | 五色 | 五味 | 五臭 | 五脏 | 五虫 |
|---|---|---|---|---|---|---|---|---|---|---|
| 木 | 春 | 孟春 | 角 | 太簇 | 东 | 青 | 酸 | 殖 | 脾 | 鳞 |
| | | 仲春 | | 夹钟 | | | | | | |
| | | 季春 | | 姑冼 | | | | | | |
| 火 | 夏 | 孟夏 | 征 | 仲吕 | 南 | 赤 | 苦 | 焦 | 肺 | 羽 |
| | | 仲夏 | | 蕤宾 | | | | | | |
| | | 季夏 | | 林钟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 | 长夏 | 中央 | 宫 | 黄钟之宫 | 中 | 黄 | 甘 | 香 | 心 | 倮 |
| 金 | 秋 | 孟秋 | 商 | 夷则 | 西 | 白 | 辛 | 腥 | 肝 | 毛 |
| | | 仲秋 | | 南吕 | | | | | | |
| | | 季秋 | | 无射 | | | | | | |
| 水 | 冬 | 孟冬 | 羽 | 应钟 | 北 | 黑 | 咸 | 朽 | 肾 | 介 |
| | | 仲冬 | | 黄钟 | | | | | | |
| | | 季冬 | | 大吕 | | | | | | |

五音十二律配四时五行十二月的宇宙图式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的基础，并至今影响着我们的音乐生活和思维方式。

人类、社会以及音乐是整个宇宙演化的结果，因此包纳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一切规则、规律和特质。在古人观念中，音乐是天——实际上是先民们假想的创世主，最早期表现为控制人类命运的各种自然神——赋于人的一种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认识大自然的工具。人不仅能通过“乐”洞悉天地、四时、自然界的奥秘，且可影响之。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雍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闷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倡导之。”

《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辰不集于房[1]，瞽奏鼓。”远在夏王朝时期人们就持有了音乐自然观念，他们在“辰不集于房”天文现象发生时，认为这是自然之神的责怪，进而用音乐去协调。

在古代中国有用不同音高的乐音或音律来表示乃至测知四时、四风的想法，乐师也可通过听风捕捉物候机变，预测岁时凶吉。

以此，《周礼•春官•大师》有“太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其吉凶”。《左传》记载，襄公十八年楚国攻打郑国，师旷知南风之不竞，而预言楚师必败：“吾骤歌南风，又歌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从音乐来判断军事胜败，这在现代人看来，觉得神秘不可理解。其实乐师参与军事是古代的一种制度。古代军队出征，先令讲师执弓劲呼，大师、瞽矇执律管定其声级，据此判军情，预断师出胜负。这是据五行理论逻辑推演而来，因为商、金同配西方，金性刚断，故商声亦然。将士呼声反应军情，商声则军士强健，斗志强，战则

[1] 是说在某年某月朔日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

胜；角、木配东方，木性可曲可直，角声则多变，反映将士措置不已，失军心；宫、土配中阳，土性可供万物生息，且为金、木、水、火之基础，故宫声反映将士团结和睦，士卒同仇敌忾；征、火配南方，火性烈，故征声性亦烈，反映主帅急躁易怒，而致将士劳顿；羽与水同配北方，水性柔弱、阴暗，故羽声亦具次性，反映将士柔弱，军令军纪不明。师旷歌南风北风，便是“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说的正是行军出师时，乐师以乐律判断军事吉凶的活动。

音乐也是天和人之间的介质，人可以通过创造“和”的音乐与天以及所有其它神秘力量，包括自然灾害、鬼神、精怪等，达到一种和谐共处的境界。

《国语·周语·伶州鸠论钟律》：“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以扬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间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出四隙之细也；三间仲吕，宣中气也；四间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也；五间南吕，赞阳秀物也；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

“……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

“律吕不易，无奸物也。”

伶州鸠的观点是好的音乐顺应四季八方之风，协调阴阳二气，阴气不会淤滞，阳气不会散逸。阴阳二气按季节秩序各居其位，才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臣民和睦，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疲惫之患。四时和顺，不会发生自然灾害和人疫兵祸。而环的音乐则“无益于教，离民怒神”。

因此，《吕氏春秋·侈乐》：“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乐记》：“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在此基础上，古人认为音乐可以使人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圣人君子的境界。而晋国乐太师师旷的“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齐国宰相晏婴的“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和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礼乐观皆出于此。

司马迁的《史记·律书》对汉代以前音律做了总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也就是说，古人把音律的产生同天地运行、星座变化、干支五行等天、地、人时间、空间联系起来进行思维。①

古人从自然界中探寻音乐的根源。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生成万物，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音乐源于包涵"五行"因素于自身的阴阳二气，五声十二律从产生之初就与自然、宇宙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因而，音乐同样遵循和体现自然界、宇宙世界的运行法则。音乐是沟通天和人之间的桥梁，人可以通过"和"的音乐认识自然、影响自然，从而与自然达到和谐共处的境界。

先秦时期的自然音乐观，来自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科学整体的认识，并促使古人积极地思考音乐与自然世界、世界本源相对应的自然规律，直接促进了哲学层面上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和探索，使我们看清了中国音乐起源的独特之处，有利于中国音乐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探讨，也将会成为中国科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修海林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

[2]　刘洪涛　中国古代科技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3]　殷玮璋　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M]，人民出版社，1994

[4]　申先甲　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M]，人民出版社，1994

[5]　（清）阮刻　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0

[6]　沈凤笙　周礼·仪礼·礼记[M]，岳麓书社　1991

[7]　栗　劲　白话四书五经[M]，长春出版社，1992

[8]　四部丛刊[M]，上海书店，1986

[9]　邬国义　国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0]　周瀚光　管子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1]　（清）郭庆藩　庄子集释[M]，中华书局，1978

[12]　中法汉学研究所　吕氏春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① 任得泽　《东方音乐思维》 开益出版社 第 83 页

[13]　吉联抗　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料[M]，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
[14]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M]，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15]　李纯一　先秦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7
[16]　黄翔鹏　乐问[M]，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00
[17]　任得泽　　东方音乐思维[M]，开益出版社
[18]　吉联抗辑译　秦汉音乐史料[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19]　 李纯一　《管子·地员篇》中的五行说[J]，中国音乐学，1994.4
[20]　[日]薮内 清　中国·科学·文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1]　沈长云　中国历史·先秦史 [M]，人民出版社
[22]　袁运开 周瀚光 中国科学思想史[M]，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3]　张晓红 远古治水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J]，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 3 月
[24]　关煜平　简评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的双重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7
[25]　唐继凯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于律吕之学[J]，交响，2000.3
[26]　张　强　古人音乐意识中的自然观[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4.01
[27]　贺香沛　先秦时期“和”的音乐美学观[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12
[28]　乐爱国　《管子》与《礼记•月令》科学思想之比较[J]，管子学刊，2005.2
[29]　王志成　《老子》之“道”及其音乐观[J]，管子学刊，2004.4
[30]　张泽鸿　从古代乐论看中国音乐的生命精神[J]，巢湖学院学报，2005.6
[31]　席宗泽　中国科学思想的回顾[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1
[32] 郑树梅　试述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J]，江西社会科学，2001.3
[33] 陈应时　五行说和早期律学[J]，音乐艺术，2005.1
[34] 宋瑞凯　阴阳五行观与西周时期的天道音律思维[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9.02